



《边疆史地》丛书

ZHONGGUO
GUOMINGUOJIA
GOUZHU
YU
GUOMINTONGHE
ZHI
LICHENG

中国国民国家构筑 与国民统合之历程

——以 20 世纪上半叶东北边疆民族国民教育为主

于逢春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边疆史地》丛书

中国国民国家构筑 与国民统合之历程

——以 20 世纪上半叶东北边疆民族
国民教育为主

于逢春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民国家构筑与国民统合之历程:以 20 世纪上半叶东北边疆民族国民教育为主/于逢春著.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6.9

ISBN 7-5316-4646-3

I. 中... II. 于... III. 国民教育—研究—东北地区:边疆地区—20 世纪 IV. G5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044 号

中国国民国家构筑与国民统合之历程

——以 20 世纪上半叶东北边疆民族国民教育为主

Zhongguo Guomin Guojia Gouzhu Yu Guomin Tonghe zhi Licheng

——Yi 20 Shiji Shangbanye Dongbei Bianjiang Minzu

Guomin Jiaoyu Weizhu

于逢春 著

策划编辑:王福生

责任编辑:华 汉 徐永进

封面设计:傅 旭

责任校对:高笑美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5.875·字数 350 千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6-4646-3/K·121 定价:63.50 元

《边疆史地》丛书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边境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差异和特点,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史地的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这套《边疆史地》丛书,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把边疆史地研究推向前进。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边疆建设,繁荣边疆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史地学研究范围广泛,举凡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都在研究之列,其有关专著、资料和译稿,将陆续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8年12月

目 录

序章 问题设定与研究方法	(1)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与课题	(1)
第二节 研究的方法、内容及其构成	(16)
第三节 先行研究的检讨	(25)
第四节 原始史料及关联资料的检讨	(27)

第一部 晚清东北边疆民族教育

——1902 年壬寅学制公布 ~ 1911 年辛亥革命

第一章 晚清的边疆民族政策与围绕着东北的国际情势	
——晚清的“近代国家”再构筑趋势下的	
东北边疆民族	(33)
第一节 东北地方民族分布的变容	(33)
第二节 围绕着东北地方的国际情势	(45)
第二章 蒙古族近代教育的肇始	(51)
前 言	(51)
第一节 晚清政府对蒙古族的国民教育政策	(53)
第二节 晚清政府对蒙古族的国语教育政策	(76)
第三节 蒙古族民族教育的要求与实现	

	——以“贡王三学”为中心	(98)
第四节	喇嘛教学塾的形态及其变容	
	——以 1902 年~1931 年的内蒙古地方为中心	(114)
小 结		(128)
第三章	朝鲜族近代教育的起步	(132)
前 言		(132)
第一节	日本对朝鲜族的初期教育政策	
	——以 1900 年代中后期~1910 年代初期的 延吉道地方为中心	(135)
第二节	日本初期教育政策下的朝鲜族教育的实态	
	——以 1900 年代后期~1910 年代中期的 “间岛”普通学校为中心	(152)
第三节	晚清政府对朝鲜族的初期教育政策	
	——以 1900 年代中后期~1910 年代初期的 延吉道地方为中心	(173)
第四节	晚清时期的中国官立朝鲜族学校教育的实态	
	——以延吉厅和龙峪养正学堂为中心	(190)
第五节	晚清民初由朝鲜族主导的民族教育之一侧面	
	——以“间岛”垦民教育会的教育活动为中心	(208)
第六节	朝鲜族的书堂形态及其变容	
	——以 1900 年代初期~1930 年代后期的 东北地方为中心	(235)
小 结		(252)

第二部 民国前期的东北边疆民族教育

——从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

第四章 民国前期的民族政策与蒙朝两民族的对应

——“五族共和”下的蒙古族与双重国籍下的
朝鲜族…………… (261)

第一节 “五族共和”国民统合下的蒙古族的动态

——内蒙古地方省制的确立以及蒙古族的对应
…………… (262)

第二节 中国朝鲜族的双重国籍化历史…………… (273)

第五章 蒙古族国民教育的深化…………… (286)

前 言…………… (286)

第一节 民国政府对蒙旗的国民教育政策

——以鄂伦春族教育为事例…………… (291)

第二节 民国前期蒙旗的民族教育要求

——以奉天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为中心…………… (315)

第三节 民国前期的蒙旗教育实态

——以嫩江中上游流域的达斡尔族教育
为事例…………… (339)

小 结…………… (360)

第六章 朝鲜族近代教育的展开…………… (364)

前 言…………… (364)

第一节 民国政府对朝鲜族的教育政策…………… (367)

第二节 日本政府对朝鲜族的教育政策…………… (394)

第三节 朝鲜族对中日两国教育政策的对应

——以 1900 年~1930 年代朝鲜族宗教组织
所主导的朝鲜族教育为事例…………… (416)

小 结…………… (444)

结 章	(452)
第一节 晚清民国前期的蒙古族与朝鲜族教育 的比较	(452)
第二节 晚清民国前期东北边疆民族教育的特质	(454)
第三节 近代中国的国民统合之历程	(458)
第四节 本研究的限界、展望及其今后的课题	(466)
本书征引文献与参考资料	(468)
后 记	(492)
《边疆史地》丛书已出书目	(496)

序 章 问题设定与研究方法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与课题

一、研究的目的与对象

(一)研究的目的

1. 中国民族主义的生成与国民(民族)国家的构筑

1860年以后,在西方的强大冲击下,中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接受肇始于西欧而通行于全世界的国际规则与文物制度。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便发轫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降,并与“主权”观念的产生密不可分。而中国主权观念的生成,既是受列强侵略的刺激而起,也是从列强那里习得而来。通过探讨“主权”而催生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按照王尔敏先生的说法,乃清末的王韬、郑观应、黄遵宪、曾纪泽、何启等思想先驱^①。美国学者柯保安(Paul A. Cohen)认为,郑观应早在 1864 年前后便具有了民

^①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族主义思想^①。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观念虽然产生较早,但“民族主义”一词本身,最初并不是由西方的“nationalism”一词直译而来,而是用“种族”、“种类”、“种”等来表述。如创立于1895年的强学会,其序云:“西人最严种族,仇视非类。”^② 成立于1897年的南学会之学长皮锡瑞是这样表述他的种界观念的:“今红种黑种为白人剪灭殆尽。……生理既失,种类遂微。”^③ 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学说。该学说认为,人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如共同的起源、祖先、语言、历史记忆、血统或种族等,而能自我认知或被他人认识,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体。西方民族国家是观念性的,得到了被民族主义神化了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所以,仅仅是隶属于某一国家共同体、并拥有共同的政治制度这一客观事实,尚不足以产生西欧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这里所存在的充其量不过是居民、国家所属成员等,而不是“民族”(nation)。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所属成员就必须积极地要求或寻求具有这种共同属性,或者作为一种愿望至少要被广泛地意识到。也就是说,一定集团的成员,作为与其他民族相区分的特定民族,意识到相互之间的共同特性,并多少具有要求守护一体性的愿望,只有这样,才能说这里有“民族”的存在。

不可否认,民族和国家、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并不存在于所有时期和所有条件下。上述作为政治范畴的“民族”以及作为主张自我的民族主义,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法国大革命产生

① 柯保安:《王韬与中国的早期民族主义》(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载《亚洲学刊》26卷第4期,1967年8月。

② 康有为:《不忍杂志二集》卷5,第35页。

③ 《湘报类纂》乙集,卷下,第13页。

了两大遗产,即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比起自由主义来,显得更为强劲。然而,即使像法国与英国这样的民族国家的发祥地,其近代开始建立的民族国家,以今日之标准衡量之,充其量也只是封建王朝的又一次改朝换代而已。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新王朝的统治者们完全地战胜了它的对手们,最后取胜的王朝把业已形成的领土当成了家庭的财富,这样就形成了近代的法国与英国的民族国家。在步入 21 世纪的今天,作为民族国家发祥地的欧洲,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国家仍存在着少数民族,即在文化上不同于居住同一国家内的主体民族的人。可见,“民族”与“民族国家”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

应该说,在国民意识到自身是政治上的统一体、并加以要求之前,通常先有一个仅仅是作为自然也可以延续其生存的时代。这时,人类对其世代居住的土地,有一种本能的乡土爱。所谓乡土爱,应该说就是自然之爱、环境之爱。自然之爱也好,环境之爱也罢,说到底是对自己之外事物的习惯性依存。这种习惯性依存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展到家族、村庄等,是以自己为中心呈波纹状扩散,其密度与距离成反比。结果,对这些人而言,带有抽象性的国家,同自己的家族、村落相比,其亲近性自然是淡薄的。当此之际,近代的民族主义唯有通过对传统乡土爱的扬弃,才能使自己产生。显然,政治上的民族意识不一定是一种自然的自发性存在。对近代的中国而言,民族是以一些外部刺激为契机,通过对先存的文化自觉的转换,把自己提高为政治上的民族的。而促使这种转换的外部刺激,就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瓜分。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以族类、文化、主权的思想反应构成其主体要素。所以,张之洞说:“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

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①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一种公认的政治运动,出现在 19 世纪末期与 20 世纪初期。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形成之路却充满了荆棘与挫折,因为在其形成过程中,分化成两股思潮。一种是以梁启超为代表,他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主要看成是对列强挑战的结果;另一种是以孙文与他的同志为代表,主要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就是说,主要以反满)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方向。今日观之,梁氏无疑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即民族主义的主流。以“驱除鞑虏”为号召的孙文与他的同志们,虽然暂时可以将“反满”作为政治上有力的战斗号角,并达到某些目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它对中国实现民族主义的长远目标是否有利,是应该再考虑的课题;它对整合国内资源以反对列强侵略的民族根本利益是否有益,也是值得冷静考量的。也正因为如此,孙文后来改变了政治口号,赞成将“驱除鞑虏”转变为“五族共和”。

尽管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形成之路是坎坷不平的,尽管其思想内容充满着歧义性,但经过从王韬到梁启超等先贤的努力,它所具有的内在倾向,像一缕不断的丝线,贯穿在整个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种族林立、地域分裂、居民分层等特质,在面临着已是民族国家的欧美列强时,暴露出它的软弱无力。两次鸦片战争也好,中法战争也罢,抑或中日甲

^① 张之洞:《劝学篇》卷上,第 2~3 页。

午战争,莫不凸现出封建体制所造成的国民分裂之严重后果。那就是4亿人怀着4亿颗心,各人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面对“举国一体”、“国民一致”的列强侵略,为了国家独立,必须消除中国封建体制所带来的国民分裂状态,从而要求民族统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作为国内对策,表现为两个方向。其一,政治力量向国家凝聚;其二,向国民思想的渗透。为了形成近代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戊戌变法、新政革命,莫不是从上述两个方向着眼。在依然存在的列强瓜分的重压中,使整个中国居民的心里都具有国家的思想,即民族国家建设这一切实课题,就寄托在晚清民初的思想家与教育者的肩头上。民族国家建设意味着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一原则的现实追求与政治诉求,进而意味着否认国民中的民族(种族)多样性。而能将国民统合为一体的,唯有国民教育一途而已。工业的发展、铁路的开通,使大批的农民进入城市,他们在日益瓦解着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同时,扩大了民族主义潜在的支持者队伍。近代教育的普及摧毁了传统的信仰,这为民族主义思潮的长驱直入恰到好处地留下了一个缺口。民族主义本身拥有之义,便是要求将同质的国民教育向全体居民实施,将国内全体居民塑造成一种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将使任何一个成员彼此间都有关联性,都受到相同的利益的鼓舞和激励。这种国民教育必须提供前近代教育所缺乏的东西。对全体居民实施基础教育,其浩大的费用与组织功夫,是除了国家以外,任何组织都无法承受的。而由国家统制与主导的国民教育,自然地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摆在了比“基本三会”(读、写、算)更重要的地位上。曾几何时,教育还是一个家族事业,一个私塾先生就可以承担教育之责,就可以造就人。随着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时代的到来,随着与民族主义如影随形的民族国家的构筑与登场,那个教育是私事的时代便自然地 from 历史舞台上隐去。

中国近代的国民(民族)国家的构筑,是在一个多民族(种族)国家中进行的。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民族主义很可能导致民族(种族)意识的另类觉醒,发生民族(种族)分裂,或者由各种原始忠诚培育起来的离心趋势,从而得以张扬。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民族)国家在中国近代构筑时,需要发展或培育一种自己的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那么,晚清民初的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国民教育来担承造就“共同的民族性(nationhood)”,即统合国内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种族)而形成“中华民族”这一历史重任的呢?近代国民(民族)国家构筑的终极目标是“举国一体”、“国民一致”,即所谓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一政治诉求意味着最终否定国民中的民族(种族)多样化。就文化上统一的、同质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要求而言(尽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彻底达到),地方的或者部族(种族)的方言,应该被一种标准的国家共通语所取代;地方的或者部族的习惯与传统,应该为一种规范的官定的历史叙事与记忆程序所取代。那么,晚清民初的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国民教育来推行这种理念并希冀培育具有同质性的国民的呢?为了充分地解明这一课题,本书选择了东北地方,期望通过剖析具有代表性的晚清民初时期的东北边疆民族诸般教育,管中窥豹,观诸全国的状况。

2. 东北地方在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的地位

因 1840 年的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被纳入了近代国际秩序之中。清朝支配下的中国,是一个拥有许多民族(种族)的多民族国家。近代的中国,必然面临着作为多民

族国家如何形成近代国民(民族)国家的课题。

“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近代中国”,其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由单一的民族构筑国民国家”的论理挑战。现在回过头来说,恰恰在三四十年前,西方先进国家的人们对“一个民族(nation)作为各种各样的国家而独立,其国家体制必须是国民主权”这样的国民国家的神话还完全地相信。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细亚诸国的独立运动、1960年代的“阿弗利加之岚”,即非洲独立运动与革命等,那个国民国家的神话——自然而然地归于沉寂。无论如何,人们明了nation(民族、国家、国民)与ethnicity(民族)之间有着差异的问题,仅仅是近三四十年以来之事^①。从而说明,在今天,“多民族可构筑近代国家”虽然是一般的常识,但在20世纪前半的世界却不被认知。为此,战前的日、俄、欧美列强诸国,对中国的边疆民族,特别是日俄两国对于处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东北边疆民族,执拗而持续不断地策动其分离的独立运动。

中国东北部从来都是多民族居住的地方。19世纪后期以降,东北地方因汉族与朝鲜族的大规模移住,使得民族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复杂的民族关系随之生成。进而由于在东北地方,具有治外法权的日俄两国的存在,使得民族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日俄两国的策动下,所谓的“蒙古独立运动”与“间岛问题”等民族问题渐次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半的东北地方的历史,是中国抵抗着高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招牌而妄图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日俄两国势力的过程。晚清以降,在东北地方,以西欧型的近代国家的建设为榜样的活动

^① 《牛津英语大辞典》对“ethnicity”一词的收录,始于1970年版的“补遗”。

愈发活跃。因此,在那里被追求的是,凭借工业化使得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国家的境遇,并克服整个社会领域,即经济发展与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多元性。为此,以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为基础,将经过了近代性整合的意识形态——“满汉一家”(清)、“五族共和”(民国)作为轴心,组织起了民族主义运动。晚清民初之中国政府,一方面意识到日俄两国的威胁。另一方面,将对东北边疆民族的慰抚、怀柔,直至统合作为标的,希冀在此基础上达到形成民族国家的目标。基于这样的时代要求,传统的教育形态与模式,毕竟是无法适应的。全面地否定旧教育形态,创设近代教育制度,便是东北地方近代实施的彻底地教育改革的目所在。由于对欧美日诸国的富强,一般解读为——是建立在其国民全体开化的基础之上,故当时的思考方式,一言以蔽之,只有提高一直被“封禁”(后述)的东北边疆民族的知识、技能的水准,唯有对东北边疆民族实施国民统合,才是最重要的课题。在这样的状况下,作为国民统合的国民养成教育(国民教育),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东北边疆民族之中生成。

不可否认的是,围绕着东北边疆民族的近代教育与国民统合问题,尽管这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但关于其教育史的研究却是不充分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曾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强烈影响的蒙古族教育史的研究,更是不充分的。另外,在中国的各个民族之中,特别是人口超过百万的民族之中,无论是儿童就学率,还是高等教育入学率,均处于最高水准的朝鲜族,虽然对其教育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绝大部分以抗日教育为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定式化的朝鲜族近代教育史研究,在有意无意间被朝鲜族抗日教育研究所替换,这种研究趋势与方向,使得朝鲜族近代教育的全体像仍处于未被解明的状态。